

XITONG YU SHEHUI

系统与社会

系统与社会

[苏] B.Γ.阿法纳西耶夫 著

贾泽林 苏国勋等 译

2411/03

知 识 出 版 社

系 统 与 社 会

[苏] B.Γ.阿法纳西耶夫 著

贾泽林 苏国勋等 译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 603 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48 千字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20

定价: 3.70 元

ISBN7-5015-0293-5/C·3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学者B.Γ.阿法纳西耶夫论述社会管理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1980年出版后获得苏联学术界的好评。作者20多年来专门研究社会的系统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概括。书中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比较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社会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及其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意义,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对社会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社会系统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等当代最关心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索。本书对广大的哲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人员以及实际工作者,是一本较好的参考书。

译者说明

近年来，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从系统论观点考察社会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著作，本书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作者B.Γ.阿法纳西耶夫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曾先后发表了几部用系统方法分析社会客体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科学地管理社会（系统研究的经验）》（1968年）、《社会信息与社会管理》（1975年）、《社会管理中的人》（1977年），等。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本书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从哲学和科学上研究了“系统性”范畴，他把系统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间层次来进行考察，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地应用于社会管理的一些问题。

作者在全部论述中对问题的认识论方面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比较详细地考察了系统中客体和主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整体同部分的辩证法，与此同时强调系统性的认识论方面和逻辑方面源于系统性的本体论方面。譬如作者分析了系统的历史方面同结构方面、结构功能方法同发生学方法的彼此对立后认为，这种对立仅仅是在认识论上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也是相对的。同样，系统的功能规律同发展规律的差别也只有相对的意义。

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对西方的系统运动，从一般系统论到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和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

都做了简略的分析和概括的评价。指出它们最初都面对的是相当狭窄的研究范围,但随着规模和范围的不断发展壮大,现在有人企图把它抬高到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地位,甚至起到总的世界观的方法论作用。作者明确地反对这种作法,同时也指出了西方学者在系统研究方面的肯定的方面和积极的成果。

作者的这些分析和见解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和借鉴。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贾泽林(引言,第一章)、苏国勋(第二、三章)、周国平(第四、五章)、王炳文(第六、七章)、王正义(第八章第1~2节)、李树柏(第3节)。全书由苏国勋校订。

1983年12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整体系统, 整体	(20)
1. 整体系统中的主要东西——综合质	(20)
2. 整体系统的其他属性	(31)
3. 系统: 实际存在还是理性的产物?	(37)
4. 从系统的多样性到系统观点的多样性	(47)
5. 系统性、整体性的因素	(56)
第二章 整体系统的组成成分、部分。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	(73)
1. 组成成分、部分的概念	(73)
2. 统一、同一和矛盾	(78)
3. 整体的主导作用和部分的相对独立性	(94)
第三章 整体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113)
1. 结构、内部组织	(113)
2. 反对唯心主义的结构观点和结构的绝对化	(133)
3. 整体系统及其组成成分的功能	(141)
第四章 整体系统及其周围环境	(160)
1. 系统和环境的统一及相互作用	(160)

2. 社会系统的自然环境因素	(170)
3. 社会系统的社会环境	(184)
第五章 历史主义和系统性, 系统的形成、完善 和发展	(192)
1. 历史主义和系统性	(192)
2. 系统的产生	(202)
3. 系统的完善和发展	(210)
第六章 系统的管理, 信息	(218)
1. 关于管理的一般特点的控制论	(218)
2. 自发的管理因素和自觉的管理因素	(224)
3. 对社会的科学管理	(238)
4. 作为统合因素和管理手段的信息	(250)
第七章 作为系统的社会和人	(269)
1. 作为系统的社会—经济形态	(269)
2. 人是社会系统中的普遍成分	(294)
3. 关于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309)
第八章 历史是社会和人向高级整体性的运动	(332)
1. 个性和社会的同一与矛盾。从氏族 制度到资本主义	(332)
2. 资本主义是对抗性矛盾的系统	(344)
3. 共产主义形态是社会和人的整体性的 最高类型	(361)

引 言

我想,如果指出这样一点,即“系统”、“系统性”、“系统方式”(системный подход)等等当前在科学中(在实践中也同样)是流传最广和最时髦的术语,是不会错的。可以有根据地说,在科学研究和实际事务中“系统运动”当前已经广泛地(尤其是在西方)开展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在科学中也会有时髦现象出现?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时髦,而在于现代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和科学与实践每天每时所遇到的愈来愈复杂而多种多样的任务。很多、而且愈来愈多的研究人员和探索者、设计者和制造者、建设者和应用者正在变成系统论者,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中一些人(这是多数)是出于必要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要求而成为系统论者的,也有一些人(这些人不多)则确实是出于追求时髦而成为系统论者。

现代科学和实践的成就确凿证明,我们周围的世界(物质的和观念的)不是由单独的、彼此孤立的对象、现象和过程组成的,而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客体的总体、由各种类型的系统的、整体的构成物构成的。

与此相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面临着一项重要任务——对这些总体和系统既要就其本身又要从其与其他系统的联系方面来进行研究,揭示系统的本质及其多层次的表现,对其进行分类,找出其相似和差别,揭示其起作用 and

发展的内在辩证法、其与外部环境的条件的相互作用，等等。

研究整体系统对于研究物质运动形式、科学分类、弄清运用数学方法和物理化学方法去认识现实(包括社会自然界)的不同领域的可能性、模拟理论和实践，建立和使用控制理论系统、建立管理社会客体的系统以及解决许多其他科学和实际问题，都具有巨大意义。所以现代科学的卓越代表人物才把研究系统性问题看成是我们时代一项重要的科学任务。大家知道，譬如在1945年初，在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组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室的会议上，该室的组织者和第一任领导人С.И.瓦维洛夫院士就已经指出了研究整体性问题的重要性①。

科学地研究系统性和整体性问题之所以必要，还因为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投机的对象。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大大小小的流派妄图把整体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当成某种万能的原则，当成一种新哲学，当成一种世界观，当成解决科学和社会实践所有问题的方法论原理。譬如极端反动的整体论哲学(整体论——来自希腊的《χολος》一词，即“整体的”)就是这样一个派别。整体论哲学的创始人是有名的种族主义者和反动分子、南非联邦的首脑、英国元帅史末资，他在英国的庇护下，而后是在美国的庇护下鼓吹整体性思想、世界统一思想。

史末资虽然死掉了，但世界要受美国领导的整体性思想直至今日仍然统治着现代资产阶级其他思想家的头脑。如果

① 参看《哲学问题》1960年第8期第124页。

读一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的文集《我们现在处在何处?》就不难确信这一点。这部文集的许多作者当中,有许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界的极为著名代表人物,如英国历史学家A. 汤因比、西德哲学家K. 雅斯贝尔斯等人,在描绘了现代的阴暗图景和把今天的人类状况评价为处于深刻危机状况(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经历着极其深刻危机的不是整个人类而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以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在于把世界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系统和一个整体,当然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雅斯贝尔斯断言,人类的博爱社会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会出现,即西方“能够在人类之中确立自己”^①。Э. 荣格(在他的收入上述文集集中的文章《全世界政府——机体和组织》中)和某些其他作者也都谈到这一点。

妄图利用唯心主义的整体性哲学来解决科学和政治问题,也是O. 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组织论和O. 施潘的“万能论”(универсализм)等等的特点。譬如奥地利哲学家施潘——“万能论”的创始者提出万能的(“制约一切和说明一切”)系统性、整体性原则,把它当作说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所有现象的唯一手段。在此原则基础上,施潘描绘出一幅摆脱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想的整体的国家,这种国家就其类型来说却同法西斯国家颇为相似。

施潘有许多学生和追随者。为庆贺他七十五寿辰,他们出版了一部文集,用各种方式颂扬自己的老师,并一致企图把唯心地理解的整体性原则确立为特殊的哲学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譬如,奥地利教授B. 亨里赫在收入该文集的文章中写道,

① 《我们现在处在何处?》, 1960年德文版第40~41页。

整体性观念“对所有部门科学来说都是主导的观念并因此而具有极其伟大的文明意义和科学意义”，它是“能够揭示现实全部丰富性的神奇的钥匙”。亨里赫断言，整体性观念和原则使我们有可能判断“在现实存在中什么是完美的或什么是不完美的”，“对于任何学术工作以及对于理性的全部文明生活”^①都是不可取代的标志。施潘的另一个追随者R.阿穆特曼则把O.施潘的“万能的”整体性哲学的唯心主义原则宣布为“是对丰富哲学和精神生活来说……的一种基本原则”^②。

对世界观本质的毫无根据的妄求，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普遍原则立场出发解决重要方法论问题（包括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妄想，也是“一般系统论”的某些代表人物的特点。譬如A.拉波波特写道：“一般系统论是世界观或方法论，而不是理论（即不是科学中所赋予这一术语的那种含义上的理论）。正如其名称所表征的，这一世界观的特点是：这里所强调的是从其系统的共同属性而不是从其具体内容中派生出来对象或事件的那些方面”^③。

“一般系统论”是从自然科学（它不再能忍受实证主义、机械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发展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克服了学科间的壁垒，把目光转向对象和现象的系统性、整体性。它同控制论一道把研究工作者的思想集中到系统性的综合性的、控制性的方面，它对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使用数学方法和

① 《哲学和科学中的整体性》，维也纳1950年德文版第32页。

② R.阿穆特曼：《O.施潘的理论观点》1960年，维也纳，德文版第1页。

③ A.拉波波特：《对系统进行抽象分析的数学方面》。载《对一般系统论的研究》一书，莫斯科1969年俄文版第83页。该书对“一般系统论”一系列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阐述。B.H.萨多夫斯基和B.Γ.尤金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揭示了这一理论的优缺点。

模型起了促进作用。

然而“一般系统论”起不到普遍方法论的作用。这不仅是由于这种方法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早已有之并且已经可靠地为科学和实践服务了几十年，还由于许多其他原因。其中有这种方法论：

轻视系统质、系统的实体内容基础和把各系统间的相似和区别的形式特征绝对化；

轻视系统的历史、系统的产生和发展问题，把注意力只放在结构和功能上、放在对现有的、既成的系统的考察上；

把系统的诸组成成份看成是并列的、同等的和相互作用的，而不看成是在起源上相互联系的、相互派生的；

不善于和不想看到社会系统中内在的、而首先是阶级的矛盾；

不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只看作是系统的一个功能环节，扮演上级规定的诸种角色之一；

机械主义，把社会系统看成是受生物学和控制论原则制约的一架大型机器，企图把机械方法和有机方法折衷地结合起来，以此来研究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国外研究工作者也已指出西方的系统运动，包括冯·贝塔朗菲、Θ.拉兹洛、C.波普观点的局限性和折衷主义。譬如美国社会学家R.里里因费尔德指出，之所以转向对世界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观点，是由于产生了一系列理论的（一般系统论、博弈论、决策论）和实用的学科（系统分析、系统工程、操作研究等等），而且他并不是毫无根据地说：这些学科往往是未经认真研究过的，有时则是矛盾重重的。R.里里因费尔德断言，主要问题在于：西方现在形成的系统

论并不是科学认识的工具。这种极端复杂、成份各异、折衷主义地凑合在一起的世界观假设，完全取决于这一或那一学者（有大学学位的专家、教师、鉴定师、顾问、研究人员——程序设计者、管理人员）所处的实际地位如何。这是思辨构想和经验材料的混合物，而且这些材料是不按任何原则从所有学科中拼凑起来的。这是一种数学“把持势力”，企图从数学走向现实，等等^①。

至于想把系统观点运用于西方的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这种尝试则是难以奏效的。作者用把系统观点运用于各种水平（美国的资助城市的计划、州和市的行政自治活动等）的不成功事例来证明他的上述结论。

R.里里因费尔德写道，当系统观点的实际运用遭到失败时，“人们对我们说，理论是好的，只是运用不当。这当然要引起异议：如果不按运用的效果，那么按什么来判断理论的好坏呢。而且怎么解释这样一点：理论虽然未经实用证实，却仍可保持自己作为理论的意义呢？”^②。

R.里里因费尔德的论断可能过份绝对和极端了，但从其实质来说则是无可争议的。

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想用他们创造的特殊的系统性哲学来为自己的阶级的和政治的目的服务，而首先则用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系统）的不可动摇性、极端的灵活性、整体性和不矛盾性。

值得指出的是，R.里里因费尔德也指出了西方系统论的阶级性、特别是意识形态倾向性。他这本书的标题即《系统论

① R.里里因费尔德：《系统论的兴起。意识形态分析》，纽约1978年英文版。

② 同上书第192～193页。

的兴起。意识形态分析》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系统论的意识形态实质,在于妄图使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体系、资产阶级自由和生活方式得到肯定和永久化。R.里里因费尔德写道:“……系统论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它乃是意识形态,必须这样来看待它”^①。然而作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十分独特的和狭隘的,首先理解为“有识者”(专家、有产者、官吏、学者等)的意识形态,这种人极愿把社会看成是机体。在这种社会机体中,“有识者”起大脑和中枢神经的作用,垄断思维、意志和行为的过程,而大量的个体则只能起微不足道的“细胞”的作用。

在驳斥西方“系统运动”的方法论奢望的同时,如果完全否认资产阶级学者从系统性原则立场出发在考察科学和实践问题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那将会犯严重的错误。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力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在认识系统构成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发展系统性和整体性问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譬如这样一些方面:上面已提到的“一般系统论”,以及“系统分析”、“系统工程”、“结构语言学”、“结构心理学”、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生物学中的“组织论”等等,其依据都是系统性、整体性原则。例如,一般系统论撇开系统的质的特殊性来描述一般系统的某些属性,而这些属性无疑是存在的。结构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在系统的内在结构,研究其诸组成成份的相互联系也不是一无可取的。功能主义则按运动、按其外在表现、按其功能来评价系统,并把这些同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系统运动”的所有

① R.里里因费尔德:《系统论的兴起。意识形态分析》,第257页。

这些方向(这恰恰是其可取之处)都尝试用并正在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系统,揭示对其理解的形式逻辑方面,制定范畴工具等等。

尽管有这些积极因素和成就,但系统运动的许多观念仍然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对系统构成物往往采取片面态度,带有实证主义的痕迹,提出一些约定论的和相对主义的假设。

与此同时,而这一点应特别强调指出,系统运动乃是现代认识中辩证趋势的具体表现,这种趋势正在突破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等迷误的藩篱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正是自然科学中的这样一种趋势,用列宁的话说,即在痛苦中“生产辩证唯物主义”^①。

毫无疑问,系统性问题当前不仅具有巨大的方法论的,而且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但是它之具有这种意义,并不是由于它本身,不是由于它象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所说的是什么特殊的绝对的“系统性、整体性哲学”,而是由于它是唯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许多问题之一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征之一和侧面之一^②。恰恰是在这里,即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这个问题才第一次得到深入的探讨、全面的论证和发展。

M. M. 罗森塔尔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现实的系统性质的理解(以及制定对其认识的相应方法)首先是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关于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9页。

② 有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系统方式的相互关系,可参看:Л. М. 格维什安尼:《唯物辩证法——系统研究的哲学基础》。载《系统研究。方法论问题》,莫斯科1980年版。

社会及其规律性的知识变成真正的科学)中,而不是在其他科学中,得到自己最深刻的体现的”^①。

苏联出版了大量探讨系统性、系统方式的各个方面,揭示这一方式的本质、其产生和异乎寻常地广泛传播的客观和主观原因,其对科学和实践的意义,特别是其对管理社会的科学和实践的意义的著作。^②

① M. M. 罗森塔尔:《列宁对帝国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的研究》,莫斯科1976年版第84页。

② 参看 B. Г. 阿法纳西耶夫:《哲学和生物学中的整体性问题》,莫斯科1964年;B. Г. 阿法纳西耶夫:《对社会的科学管理(系统研究的经验)》,莫斯科1963年、1973年;《对一般系统论的研究》,莫斯科1969年;《系统研究年鉴》,莫斯科1969~1978年;Ю. И. 契尔尼雅科:《经济学中对系统的分析和综合》,莫斯科1970年;《大系统。理论、方法论、模拟》,莫斯科1971年;Г. 科龙:《按部分研究复杂系统——折光学》,莫斯科1972年;B. C. 丘赫金:《反映、系统、控制论》,莫斯科1972年;C. 扬格:《对组织的系统管理》,莫斯科1972年;И. B. 布拉乌别尔格、Э. Г. 尤金:《系统方式的形成和实质》,莫斯科1973年;P. 阿科夫、Ф. 艾梅里:《论目的系统》,莫斯科1974年;Л. 科里兰德、B. 金格:《系统分析和目的管理》,莫斯科1974年;M. M. 科莱斯别尔格:《美国:管理中的系统方式:工业企业的经验》,莫斯科1974年;E. B. 马林诺夫斯卡娅:《在经济中运用系统分析法》,莫斯科1974年;B. H. 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莫斯科1974年;《现代系统工程原理》,莫斯科1975年;Л. A. 彼特鲁申科:《系统性、组织性和自行运动的统一》,莫斯科1975年;《管理中的程序目的方式。理论和实践》,莫斯科1975年;C. A. 萨尔基扬、Л. B. 高劳万诺夫:《大系统发展预测》,莫斯科1975年;A. Д. 霍尔:《系统工程的方法论经验》,莫斯科1975年;Ю. И. 契尔尼雅科:《经济管理中的系统分析法》,莫斯科1975年;A. H. 阿维里扬诺夫:《系统:哲学范畴与现实》,莫斯科1976年;B. M. 格鲁什科夫:《今天和明天的管理自动化系统》,莫斯科1976年;B. B. 德鲁日宁、Л. C. 康托洛夫:《军事系统工程问题》,莫斯科1976年;B. И. 库兹明:《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莫斯科1976年;Э. A. 鲍兹德尼雅科夫:《系统方式和国际关系》,莫斯科1976年;Г. C. 波斯别洛夫、B. A. 伊里科夫:《程序目的规划和管理》,莫斯科1976年;《系统方式和精神病学》,明斯克1976年;И. 霍尔瓦特:《工业系统